

读史阅世

说史谈盾

近代福州西人市政建筑活动考察

□胡家保 文/图

茶区探访者眼中的福州

□林晓霞

仓前山是福州开埠以来外国人的居留地,其开发相比鼓岭早。西人在这一带除了兴建领事馆、洋行、医院、教堂以及俱乐部、跑马场等娱乐建筑之外,还着力推动这个区域的公用事业建设工作,近似于我们早期市政建设活动,这也是为了满足外国人能长期在福州居住的日常生活之需要。

1862年,福州仓前山一带的外国人一度由侨民组建了“福州公路信托部”(又称“道路托管委员会”,俗称“山路公司”),其职责近似于市政机构,开创福州城市早期市政建设之先河,具有一定的示范性。而鼓岭一带,来榕的外国人通过自发组织的“万国公益社”(“鼓岭联盟会”)、“公共发展委员会”,提供鼓岭避暑社区管理和维护,一定程度上具有早期城市市政社区管理的雏形。他们在鼓岭兴建医院、钱庄、教堂、商行、邮局、网球场以及游泳池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特别是“万国公益社”,其在鼓岭避暑社区组织、管理、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禅臣花园(位于程埔路172号,仓前山南坡)是仓前山禅臣洋行创建的独一无二的公园,也是近代福州最早的西式公园,占地面积约15亩。早在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该花园就建造了西式园林小品,如喷泉、水池、铁链桥、玻璃花房、雕塑等,还引进了世界各地的奇花名木,名噪福州城。

据相关文献考证,禅臣洋行是目前所知唯一在福州设立永久机构的德国公司,并长期代理德国驻福州领事。1894年,德国将驻福州的领事馆设在禅臣花园内,挂起领事馆的招牌,以至于“禅臣花园”一般被人称为德国领事馆。此外,德国领事馆还定期在该花园组织“禅臣茶会”,各国领事和清廷官员均在其邀约名单之中。

民国六年(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后,禅臣花园及其宿舍遂作为敌产被北洋政府没收。原德国领事馆宿舍、花房、雕塑等均已不复存在,喷泉、水池仅剩残迹。1939年,禅臣花园被政府收回,被改建为福建省研究院。新中国成立后,研究院并入福建师范学院生物系,后转交给福州时代中学使用。

仓前山地区最早只有土路,雨天泥泞寸步难行,且道路逼仄陡峻,令马车、人力车难以通行。清末福州政府因财政窘困,地方官也无力主持市政建设活动,难以改变其现状。1862年,仓前山外侨组建“福州公路信托部”,负责营办市政道路等工程建设活动,运营经费由洋行及道路使用者摊派。其起初规定骑马者每年交6元,步行者3元。通过这种手段,外侨们对修筑道路进行系统化建设,保证市政工程建设经费具有可持续性。

到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年初,仓前山一带初步形成道路网,包括乐群路、麦园路、对湖路、天安里、槐荫里等道路都已形成。信托部的道路建设还推动仓前山地区其他市政项目建设,如为



1902年德国领事馆组织“禅臣花园茶会”。

仓前山主要道路安装路灯。随着煤油的输入,仓前山大桥出现了第一盏路灯,这给夜行人带来了便利,使城市面貌得到很大改观。

洋墓亭是一个教会公墓,始建于1848年,包括南园和北园,南园旧址绝大部分在今福建师大附中校园内。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因传教士怀德牧师之妻病逝,清政府允许美以美会在仓山桃花山麓租下地界筹建怀德夫人的坟墓,这就是福州洋墓亭的肇始。当时,该地周围是福州本地人的坟场,后在“福州公路信托部”的运作下,周围本地人的坟墓被迁走,教会墓地的范围逐渐扩大。

当时的外国人墓地主要有三处:英国墓亭在石岩山麓;法国墓亭在留山;美国墓亭在烟台山。三者中唯有英国墓亭准许他国附葬,其设施齐全,规模最大。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洋墓亭已发展为占地面积约2平方公里的大型墓园,埋葬者自1840年至20世纪50年代一个世纪来逝世于福州的400多名外籍人士,他们中有领事官员、传教士、医生、教师、商人,所有墓穴规格统一(2米长、1米宽,间隔0.5米),整齐排列。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口通商后,英国人在闽江口川石岛设立大东电报水线公司,其承办的电报水线(位于今连江县琯头镇的川石岛狮头山)敷设自福州至香港及上海两条水线,全长475海里,还有至台湾淡水的一条水线,全长117海里。1887年,在台湾巡抚刘铭传主导下,由船政炮艇“飞捷”敷设川石至沪尾海底电缆,全长117海里,于9月完工。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安装

的第一条海底电缆。

在市政建设方面,1842年福州仓山最早兴起“电话”通信设备,是由禅臣洋行的德国商人安装磁石式电话交换机开始,又名“德律风”,当时仅限于各国领事馆、各洋行和商人住宅使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福州的总督衙门也开始安装电话交换机,以后移至南门外茶亭,旋又移至城内学院前,共装磁石式电话交换机3部,容量100门,专供军政衙门和达官显宦的住宅使用。在西人市政营建的影响下,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福州洋务局遂会同财政局筹设福州电话公司,后因经营不善,最终由福州巨商刘家接办,定其名为“福建电话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解决这些领事人员及传教士的饮用水问题,清光绪五年(1879年),美以美会教士筹建自来水厂,这是福州最早的小型自来水厂,厂址设在仓前路益仓隔壁的小弄里,那里是水厂的进水口处(一个名叫“玻璃窗”的临江点),并在闽江江心安装了铁制沉箱,江水通过沉箱过滤后连接300多米、口径2英寸的铁管导水到岸旁,再用抽水机把水送到乐群路,供应美国领事馆、传教士府邸、鹤龄书院等10多户饮水,日均供水量达到几十吨。

1915—1925年间,因马高爱医院和华南文理女子学院要求供水,原来水厂的设备没法满足,后经传教士班谷等人大幅度地改建与重组水厂设施,才勉强维持其供水能力。据相关资料记载,范工程师及其团队通过向西移进水口200米,在

江滨建一沙滤水井,在其上盖长方形泵房,成为整体结构,增扩送水铁管口径至4英寸,优化自来水送水线路,改由以金峰巷庙为中转,分别送到华南女院和乐群楼,并建立蓄水水塔两处:华南女院一处,神学院一处。此后日均供水量高达40多吨,用水户数随之倍增,日、荷、法、德等领事馆,英国汇丰银行以及寻珍学校都是由该供水系统供应。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鼓岭上的外国侨民自发组建了“鼓岭联盟会”,即“万国公益社”。1887年,公益社的“救旅旅”还分别在鼓岭的三宝垅和梁厝创办学校和侨民医院。学校名为岚光小学,是教会的附属小学,聘用北门兜牧师张亨恩及其子张利荣任教。创办的侨民医院在梁厝村,服务的对象虽说是侨民,但医生以救死扶伤为职责,所以对鼓岭的山民也是一视同仁,对穷苦的百姓还免费诊疗。

到1902年,联盟会拥有125个会员,会员均来自各国侨民。他们在鼓岭上做了许多公益和慈善事业,比如“游人欲租房屋,可托社中代觅。欲雇筑下山或挑夫等,可托社代雇。物件之代收、球类之代借用,皆为公益社之义务”。鼓岭人有民房可租给外国人避暑,只要向公益社登记就行,可以省去许多讨价还价和有无价值的麻烦。因此,这时候的公益社就像现在的房产中介,成为鼓岭对外开放的窗口。

1902年6月16日,鼓岭邮局正式开办,它是我国早期五个著名夏季邮局之一。鼓岭邮局原来属于福州邮务总局,其首任主管为张瑞来。1905年,闽海关拨款1500银两,在鼓岭旧街崎山顶盖房屋,专供鼓岭邮局使用。其为单层房屋,外墙用不规则的石头垒成,虽外表粗糙,屋内却颇为讲究,有百叶窗、壁炉等设施,屋旁还有一口井。

鼓岭邮局又称鼓岭夏季邮局,属季节性邮局。自从开办以来,其每年一般在五月初旬节后开张,八月中旬节后关闭。起初每天封发一次,之后改为每天两次。1912年,鼓岭曾发现老虎出没,教会、游客请求天黑时免于投递。至1917年底,鼓岭邮局在当地设置3个信箱。

1925年,公益社帮助邮局绘制《鼓岭手绘地图》,将鼓岭的住房及公共场所分片编号,手绘地图里所编号码多达496号。可以说,鼓岭手绘地图的标注厘清了鼓岭的邮递路线,方便外侨与外界联络或者邮寄物品,大大提升区域的公共生活质量。同时,其作为历史印迹留存具有一定研究价值。

对于邮局的兴办,传教士毕力评论道:“因为鼓岭邮局的存在,许多外籍侨民能与世界各地的亲友分享福州之见闻,并在避暑胜地度过愉快而舒心的夏季时光。”可见,在当时历史语境下,万国公益社在“融贯中西”(外侨与鼓岭山民的融合、相适应)的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地方文献整理研究中心)

屏南县棠口村西洋建筑群

□林雨泓 吴卫 文/图

棠口村位于屏南县城北部,距城关6.5公里,因岭下溪与白溪在村口交汇成棠溪而得名棠口,现为棠口镇政府驻地。棠口村于2012年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也是福建省历史文化名村,自古以来就是屏南县最主要的文化、商业、手工业中心之一。村中历史古迹丰富多彩,除了千乘桥、八角亭、祥峰寺以及10余处保存良好的传统民居外,还较好地保存着一个清末民国时期的西洋建筑群,它们是屏南最早的西医院和近代学校的旧址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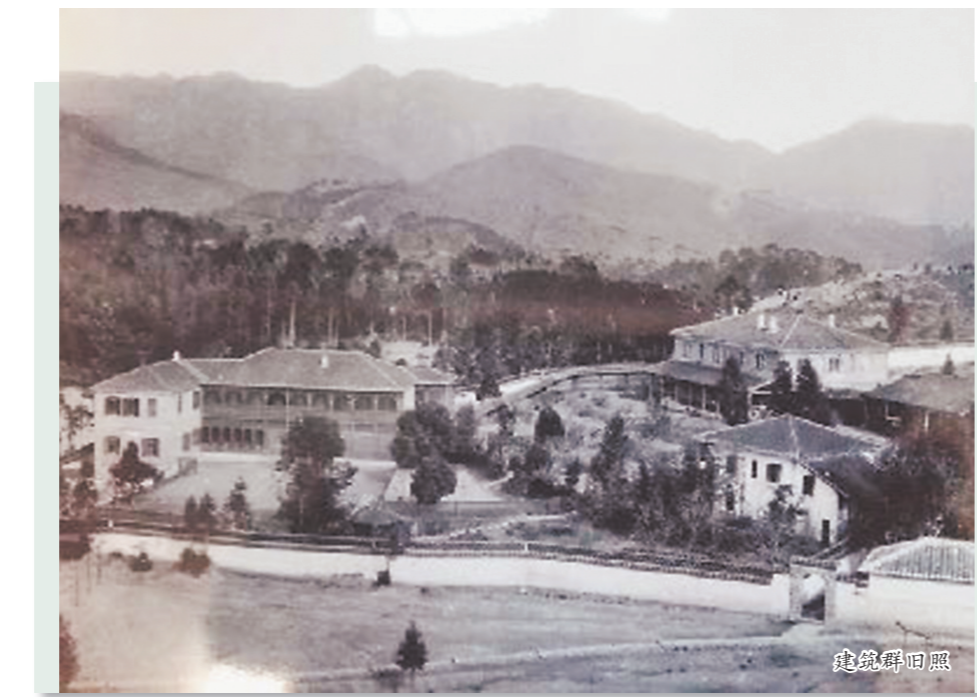
据当地县志等文献记载,自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起,英国新教差会圣公会陆续派遣人员自邻近的古田县来到屏南,在棠口村租租房房进行传教。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差会以买、赠、换等方式,在棠口村的龙身岗征到山地25亩,着手开始建设,共分六个阶段进行施工,依次是围墙、门房和姑娘厝、妇幼医馆、贞英女校、淑华女校、女子体操亭等主体建筑,最后建配套设施,至民国四年(1915年)竣工,历时11年。每座建筑间隔约30米,以风雨长廊联系。

经历100余年的风雨沧桑,原建筑群中陆续有坍塌、拆除、改建等情况发生。现存保留较好的主要由三栋建筑组成,分别是姑娘厝、潘美颐医院旧址和淑华女校旧址。这三栋建筑也曾长期荒废弃置,直至2017年以来,因为有民间人士出资陆续修缮,将其作为一个艺术馆并安排专人负责日常的维护管理,这个建筑群方才重焕生机。

三栋建筑都是由潘美颐医生募集资金并亲自监督工程设计和施工而建成的。潘美颐医生1867年出生于英国上霍洛威,在英国皇家自由医院取得内外科、药剂科的执照后被圣公会派往中国。她于1902年至1916年期间在棠口开办妇幼医馆,专门接治妇孺,因医术高明而一度享誉屏南县乃至周边的古田、建瓯、政和、周宁等地;后又创办了淑华女校,开屏南近代教育史之先。

姑娘厝于1909年建成,是当时的外籍女性传教士和医护人员的住所。这是一栋两层的砖木结构建筑,建筑面积520平方米。从老照片上看,姑娘厝的正门入口开在西南侧的山墙,原有一个单披檐的门罩;西北立面原建有一道单披檐的木构外檐廊。虽然门罩和外檐廊后来被拆除,但墙基和墙身上的两排孔洞至今清晰可见。

这种外廊式的形制是中国近代建筑早期的普遍特点。其源头是18世纪西方殖民者进入印度后,为适应当地炎热潮湿的气候而发展出的一种



建筑群旧照

建筑形式,后来逐渐流行于东南亚以及我国的华南沿海地区。

姑娘厝所有房间门窗均为西式风格,门顶端为合掌形,上置扇形玻璃窗,房门安装弹簧自动锁,配上铝质拉手;窗户为百叶窗。一楼设活动室和阅览室,二楼为寝室,每个房间内均设有壁炉。

潘美颐医院即妇幼医馆,早期条件十分简陋,由一个茶叶加工厂改造而成,人员、器材、床位都严重缺乏,潘美颐医生不得不每周在棠口和古田两地来回奔波。新的医院建成于宣统二年(1910年),是屏南县最早的西医院。整体建筑为两层,东西朝向,平面呈曲尺形,中部前廊式,北端内廊式,每层十五开间,建筑面积为968平方米。据记载,医院内原设有门诊间、药房、内科、外科、检验室和手术室;有病床60余张、医生4人(外籍3人)、护士10余人。在1926年潘美颐医生去世后,村人将妇幼医馆更名为潘美颐纪念医院,简称潘美颐医院。

淑华女校于民国二年(1913年)建成,是一栋三层的砖木结构楼房,占地面积405平方米。建筑坐北向南,每层七开间,第一、二层有外檐廊。与

姑娘厝不同的是,这里的外檐廊是砖砌的拱券连廊,二楼连廊正中位置的栏杆也是石制校名匾额设置处,因此为砖石结构,其余均为木制栏杆。

昔时女校招生人数56人,主要面向教徒子女。学校采用寄宿制,以四个月为一学期,每天有8节课,开设有英语、国文、算学、历史、地理、图画、唱歌和体育等课程。同时附设幼稚园,招收4至7周岁幼儿。入园幼儿一般30至50人,分大中小三班,由教会指派教教员2人。幼稚园学制3年,秋季始业,课程设有语言、计算、图画、唱歌、游戏、手工等。

民国四年(1915年)英国人安立安又创办了陶英小学,专收男生,校址也设在淑华女校内。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英国圣公会在淑华小学的基础上又创办淑华女子初级中学,成为屏南最早的中等学校,也是今天棠口中学的前身。

西式的医院、学校在客观上促进了屏南县医疗卫生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近代化。以潘美颐医生为代表的这批西方人士也在长期的工作、生活中认识了中国文化,与当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潘美颐医生回国后还将这一段经历进行整理,撰



姑娘厝

潘美颐医院

淑华女校

写了名为《在华生活的浮光掠影》的回忆录。

该建筑群虽然由西方人设计,但在修建过程中特聘了古田县的建筑师程光负责施工。动工前,教会还在约1公里之外的白土垅专门投资创办一个砖瓦厂,生产统一规格的青砖瓦片专供该建筑工程。中国建筑师和工匠在参与的过程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这些西洋建筑上留下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某些元素。例如在淑华女校外檐廊两侧的石山墙就明显借鉴了该地区封火山墙的形制做法,建筑群外围的土墙则采用了传统的版筑土墙工艺。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西洋建筑的一些优点被部分当地传统建筑借鉴运用。例如在民居建筑上会看到为改善室内采光而在每个房间上方的屋顶修建了一个阁楼式采光口的做法,又或是将门框、窗框做成西式圆拱或尖拱造型,中西特色融合颇为别致。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种特性未必要在宏大叙事中才能得见,而是广泛存在于我们身边文化遗产中,棠口村的西洋建筑群正是反映这种特性的典型案例之一。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19世纪更是红茶发展的迅猛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广州五个通商口岸。随着西方对武夷红茶的需求,福州成为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城市之一。

19世纪30年代,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对中国沿海一带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考察,矛头指向福建,范围包括福州、闽江流域及神秘的武夷茶区,主要探察有三次。1832年“阿美士德号”对福建沿海进行了第一次侦察,福州临近茶区特有的地理位置给这次航行的指挥官林赛(化名胡夏米)和传教士郭士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该船在福州停留了27天后,因不能到达“最好红茶产地武夷山区”而“遗憾”放弃。

1834年11月,英国鸦片商人戈登与郭士立再次前往福建,乘小船沿闽江而上,进入了武夷茶区。在向当地茶农详细了解茶树的种植、茶叶加工、茶叶病虫害、茶叶销售等情况后,他们如履以地来到茶园。戈登还亲自“在3到4个茶园里采集了标本”,带回了茶种。

1835年5月,他们再次前往茶区,这次美商传教士史第芬也一同前往。由于清军的拦截,此次探险刚刚进行一周就匆匆收场。但他们收获颇丰,即对闽江流域的防务状况进行详细了解,探明外国人要深入中国内部困难重重。

尽管这三次探险充满着“挣扎和煎熬”,但也为后来英国园艺学家罗伯特·福球对武夷山红茶产区进行考察做了良好的铺垫。1848年,福球接受东印度公司的派遣,深入中国内陆茶乡,在他的游记《两访中国茶乡》中比较详细提及他在福州和去红茶产区的一些体验。

“福州府的城市和郊区坐落在山间的一片开阔地上,大约距离闽江口有20英里远。闽江从其郊外流过,连接两岸的就是著名的万寿桥。”和前面三次传教士去红茶区一样,福球也同样受阻。“我很想深入到农村去,特别是到那些出产红茶的山区里去。但是那些中国官员——他们通过探子对我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极力劝我不要这样做。他们把我的情况汇报给领事,诱使我相信他们。”

但福球告诉中国官员,他铁下心来要去看一看。九曲溪在武夷山中随着山势而迂回环绕,“我们现在翻过大山,朝着星村镇的方向走去,星村也是红茶交易的一个大市场”,“这儿出产一种特别高级的小钟茶和白毫茶”……后来,福球将中国茶树种与制茶工艺引进到东印度公司开设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园,结束了中国茶叶对世界茶叶市场的垄断,给中国经济、文化带来巨大的影响。

传教士和植物学家等对武夷茶区的考察,搜集了大量关于武夷茶叶栽培、防治病虫害、气候等信息以及当地茶农对外国人的看法,还刺探清政府的防御情报等,其内容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福建本地人所写的游记和报告无法超越的,这些大大加深了英国人对武夷茶叶和当地风土人情等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印象。而游记和探险报告对福州茶叶贸易进行了大肆渲染,引起英国人对福州独有的重要经济价值的高度重视。

另一方面,茶叶贸易带来的财政充裕使得当地官员对外国人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左宗棠创办马尾船政的经费就是从福州海关收入中提取的。马尾造船厂、邵武煤矿、古田铁矿、福州糖厂、福州面粉厂等近代工业项目都与茶叶税收息息相关。同时,茶叶贸易促进了福建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的发展。1844年福州开埠,先后有英国、法国、美国、荷兰、葡萄牙、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丹麦等17个国家在仓前山设立领事馆。

以茶叶为主的出口贸易还带动了其他产业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茶行兴起甚至让西方建筑风格融入福州古老的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仓前山公共建筑基本变为西洋风格。茶行兴起也促成开辟鼓岭避暑胜地,禅臣洋行、天祥洋行、宝德洋行、汇丰银行等都在鼓岭建造别墅。

在19世纪福州的茶叶贸易中,夹杂着西方经济的入侵和文化宗教的渗透,客观上刺激了福州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转变了以往陈腐的旧思想,培养了一批爱国进步的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如严复、林纾、黄乃裳、林斯琛、侯德榜等。

总体说来,作为19世纪茶叶贸易中心,福州见证了与西方的贸易往来,当中凝练了许多“跨文化”的表征。这种“跨文化”并没有明确消弭边界,而是承认边界基础上的交错,显示文化交往中的互动关系和动态过程。在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的双重推动下,19世纪的福州是一个很好的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双向窗口——对中国国内,使中国人了解作为“他者”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对世界,使国际社会更了解真实的中国,减少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加深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